

二元网络嵌入与农民工创业韧性

芮正云 史清华

摘 要 以往农民工创业研究肯定了外部网络嵌入的重要性,但是很少探讨其对创业韧性的作用,以及不同类型网络嵌入的交互性与时空差异性。基于创业网络理论,探讨二元网络(社会网络与互联网)嵌入对农民工创业韧性的影响机制,运用回归分析方法进行实证研究,结果发现:社会网络嵌入与互联网嵌入均对农民工创业韧性具有积极作用,且社会网络嵌入的效应更强;社会网络与互联网的叠加嵌入具有协同效应。创业反思在二元网络嵌入与创业韧性之间起到中介作用。农民工创业者此前行业经验能够正向调节互联网嵌入与创业韧性之间的作用关系,而既有的职能经验主要正向调节社会网络嵌入与创业韧性之间的作用关系。从创业阶段异质性来看,初创阶段农民工创业韧性受社会网络嵌入的影响更大,成长阶段互联网嵌入更为重要。城乡分组回归分析结果显示,留城创业农民工受到社会网络嵌入的影响更为突出,而返乡创业农民工受到互联网嵌入的影响更大。

关键词 创业韧性;创业反思;互联网嵌入;社会网络

中图分类号 F323.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2-7320(2026)01-0121-14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21&ZD077)

当前,我国社会经济转型掀起了农民工创业的热潮,这一特殊群体的创业活动在增加社会财富、繁荣市场经济和缩小城乡收入差距等方面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但是,我国农民工创业呈现出高创业率、高失败率的特点^[1](P746-753),这就需要农具有有一定的创业韧性^[2](P96-108)。大量的农民工创业失败不仅会导致创业者血本无归、失去生活保障,甚至还会影响到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可见,帮助创业农民工提高创业韧性、改善农民工的创业表现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毕竟创业活动具有较大的不确定性,创业过程也面临危机、挑战、挫折等各种困境,而创业者在面对这些困境的时候,需要沉着应对,及时舒缓恐惧、焦虑、不安等负面情绪,进而取得良好的创业绩效。农民工创业者虽然在其先前的外出务工过程中积累了一定的创业资本,但是与大学生、留学归国人员等创业群体相比,在信息识别、知识技能等方面依然存在较大差距,况且创业活动往往不确定性较大,难免会遭遇各种失败和挫折,也势必会面临更大的心理打击。因此,学界应当重点关注农民工创业韧性,但现有成果较为零散,关于农民工创业韧性的前因及其培育机制的系统性研究尚付阙如。创业韧性是指创业者所呈现出临危不溃的坚强状态,反映了个体在创业过程中有效应对创业困境和环境冲击的能力。作为一种积极的心理资本,具有较高心理韧性的创业者能在面临困难、失败和挑战时,更好地顶住压力、不畏失败、勇于克服逆境^[3](P658-694)。有研究表明,创业韧性有助于创业个体在面临困难时实现自我恢复与成长,并最终获得理想的创业绩效^[2](P96-108)。那么,如何才能增强农民工创业韧性,助力其克服创业困难与挑战,避免出现农民工创业“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的结局?

创业网络理论强调,创业者的关系网络是新创企业获取资源、识别机会与应对风险的核心渠道^[4](P214-238)。尽管选择创业的农民工在知识结构和市场地位等方面都处于劣势,但可以充分利用乡土

社会差序格局中的“强关系”和打工过程中建立的业务联系,克服自身创业劣势,在更广阔的范围内搜寻和利用外部资源^[5](P27-38),促进创业学习与人力资本提升^[6](P61-77)。可以说,社会网络嵌入是培育农民工创业韧性的内在要求。但是,目前主要关注了社会网络的作用,尚缺少从互联网嵌入视角探讨如何提升创业韧性的理论发现。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和电商的兴起^[7](P100-109),农民工创业者可以借助互联网突破自身社会网络成员层次偏低和同质化的瓶颈^[8](P108-117),寻求更广泛的资源和支持。个体在互联网中受到社会、心理、经济等关系力量的束缚,从而与网络中其他主体形成联结,称为互联网嵌入^[9](P96-112)。由此,农民工创业者从之前单一地依赖自身社会网络,逐渐转向“现实”与“虚拟”相融合的复合型网络嵌入形态。在这种双重网络叠加嵌入的特殊情境下,农民工创业会受到怎样的影响?对于该问题的解答,一方面有助于深化和拓展过去关于创业网络的研究,另一方面也更有利于为农民工提供更符合其创业实际的指导和帮扶。因此,有必要从互联网与社会网络嵌入的协同交互视角开展研究。

一、理论基础与研究综述

创业网络理论认为,创业者的关系网络是其应对环境不确定性的战略工具,具有资源通道与治理结构双重属性^[10](P211-224):一方面,网络嵌入通过联结强度(强/弱)、网络规模(节点数量)与异质性(节点多样性)影响资源获取效率。另一方面,网络中的信任、互惠规范与权力关系形塑合作模式,进而影响资源转化效果。

近年来,越来越多的国内外学者开始从网络视角研究创业问题,网络嵌入对创业活动的作用也基本得到学者们的认可。例如,创业网络有助于创业者产生创业动机、识别新机会、获取外部资源和进行创业学习,从而促进新创企业绩效的提升^[11](P234-554)^[12](P272-280)^[13](P142-153)。在此基础上,有学者结合中国转型时期的农民工创业具体情境进行了探索性研究,目前网络嵌入视角下的农民工创业相关研究成果主要集中在以下方面:在创业前期,关系网络在创业意愿、创业决策等方面的影响^[6](P61-77)^[14](P33-45);在企业创建过程中,关系网络对创业资源获取的影响,以及关系网络对创业企业经营绩效的影响^[5](P27-38)^[15](P120-132)。

尽管相关研究已经取得了丰富的成果,但是还存在一些不足:第一,现有研究主要集中在农民工创业者社会网络作用的探讨,事实上,创业活动的开展有赖于跨越创业者个人及组织边界,尤其对农民工创业者而言,其社会网络具有较强的同质性,单纯依靠社会网络难以获得农民工创业成长所需的所有资源;虽然已逐渐认识到互联网嵌入的重要性,但缺乏考察社会网络与互联网叠加嵌入的交互影响效应。第二,如前所述,目前的农民工创业研究主要集中在创业机会、创业资源、创业绩效等方面,关于农民工创业韧性的研究较少。农民工创业韧性对其克服创业困难和挑战具有重要意义,尤其在新冠疫情、经济下行等多重危机情境下,需要探讨如何从网络嵌入视角提升农民工创业韧性。而现有创业韧性前因研究大多集中在个人因素(如个性特征、自我效能等),对于网络嵌入的作用缺少关注。第三,尽管有研究表明创业者先前经验对其创业韧性具有一定作用,但有关农民工先前经验具体如何影响网络嵌入与创业韧性之间关系的研究还有待深化,尤其是现有研究对“是否农民工创业者的先前经验越丰富,网络利用效果就越好?”这一问题并未给出明确回答。进一步地,农民工进城务工主要集中在制造业、建筑业、餐饮服务业,且大多从事的是技术含量较低的工作岗位,并非所有的打工经历都会对其创业产生积极作用,因此有必要对“哪些类型的先前经验会对农民工创业产生影响,以及具有怎样的影响,又是如何影响的”等问题进行细致分析。

根据信息加工理论,人们并非被动地接收信息,而是积极主动地对信息进行编码、提取和学习。虽然创业者的关系网络是新创企业获取外部资源的主要通道和构建市场交易行为的重要基础,但对于创业能力较弱的农民工创业者而言,社会网络和互联网嵌入除了提供必要的创业资源,还可以促进其结合外部关系网络中显性知识(如行业数据)和隐性知识(如营销技巧)进行创业反思。此外,根据张秀娥和

李梦莹总结的心理韧性理论框架^[2](P96-108),韧性是个体因素与外部资源支持相互作用的结果,基于这一逻辑,农民工创业者的网络利用效果可能还有赖于自身先前经验的适配。然而,现有创业网络研究仍缺少对内部认知机制(反思、经验)的关注。一方面,基于创业活动的不确定性以及环境的动态特征,创业者必须通过不断的反思与变革,增强新创企业的适应能力。创业反思有助于创业者敏锐地识别内外部环境中的变化并及时应对和调整^[16](P883-891),以更加积极的态度应对外部冲击。以往研究表明,创业反思通过促进团队信息知识整合、增强集体效能感,进而能根据当前或预测的环境变化做出相应调整,使新创企业在复杂、动态的情境中练就创新性适应的能力^[17](P1759-1769)。可见,创业反思可能在农民工通过嵌入二元网络提升创业韧性的过程中起到关键作用,但是目前仍缺少明确的经验证据。为此,本文引入创业反思作为中介变量,力图揭示二元网络嵌入影响农民工创业韧性的“黑箱”。

另一方面,先前经验可能影响创业者对资源价值的评估^[18](P2938-2985),进而影响创业者对外部关系网络的利用效果^[19](P140-152)。农民工在创业初期的行业选择及创业决策大多与先前务工经历紧密相关。外出务工经历不仅使其开阔了视野,具备了一定的商业意识和市场观念,还促进了个人能力的发展。而基于网络嵌入及网络资源产生的创业韧性,可能会受到农民工创业者所积累的行业、职能等方面经验的影响。根据以上分析,本文聚焦于探究在特定的先前务工经验^①作用下二元网络嵌入对农民工创业韧性的影响机理。

二、研究假设

基于以上论述,本文以农民工创业者为研究对象,整合外部(网络嵌入)与内部(创业反思、先前经验)两方面的关键影响因素构建整合分析框架,考察二元网络嵌入、创业反思与先前经验对农民工创业韧性的作用机制。

(一) 二元网络嵌入与农民工创业韧性

社会网络是以创业者的家人、亲属等血缘关系,以及同学、朋友等熟人关系为基础建立起来的“情感型”社会联系。农民工在创业过程中往往面临着信息渠道闭塞、创业资源匮乏、经营管理经验不足等问题,而社会网络的有效嵌入能够助其克服这些障碍。首先,社会网络的规模和关系强度有助于农民工发现创业机会^[13](P142-153)。社会网络中的成员数量越多,关系越紧密,越容易接触到关键性的商业信息,从而促进农民工对潜在新机会的搜寻、识别和开发。其次,社会网络是创业者获取资金等创业资源的重要途径。农民工自身资源有限,需要通过社会网络弥补创业资源的不足^[11](P234-554),较大的网络规模和联结强度有助于创业者降低搜寻成本和交易成本,提高网络资源的获取效率。最后,社会网络能提供商业讯息和管理知识^[4](P214-238),帮助创业者提高企业经营管理能力。通过与社会网络中的创业成功者进行交流,汲取创业榜样所掌握的经验 and 技巧,有助于识别管理漏洞和弥补自身管理知识不足等问题(例如如何控制成本、管理员工、处理客户关系等);通过学习、模仿或复制优秀的企业运营管理模式,可以降低新创企业的经营风险。王轶和王香媚的实证研究也表明,社会网络嵌入有助于农民工提升创业经营管理能力^[15](P120-132)。由此,本文提出如下研究假设。

H1a 农民工创业者的社会网络嵌入对其创业韧性具有正向影响。

随着新创企业的不断发展,社会网络“资源池”的效用逐渐减弱,为了实现企业的持续成长,创业者需要跨越个人的社会网络寻求组织间的资源互补,例如参与产业内的分工合作^[20](P18-39)。尤其农民工的社会网络趋同性较强,难以提供企业成长所需的全部资源,通过互联网建立新的市场交易和组织间契约关系,由此编织“工具型”业务网络。这样,创业者可以突破组织边界,在更广阔的范围内获取资源支持,从而有效弥补能力与资源短板。例如,业务网络中的知识溢出和信息共享可以帮助农民工新创企

① 结合研究对象的创业特征,本研究中先前经验特指农民工先前务工经历积累产生的经验。

业实现知识和能力的快速积累^[12](P272-280),避免陷入“原子式”发展的困境。此外,农民工在创业初期大多选择进入门槛较低的行业,提供的产品或服务缺乏差异性,新创企业面临着激烈的市场竞争。通过互联网嵌入,农民工创业者可以与业务网络中的其他节点进行沟通互动,开展技术学习与合作,从而提高企业创新水平,弥补创新性不足的缺陷,增强产品和服务的市场竞争力^[9](P96-112)。可见,互联网嵌入帮助农民工创业者克服自身“身份弱势”和企业“新生弱势”,通过信息桥接(如跨区域客户对接)与创新扩散(如数字化工具应用)提升农民工的创业困局突破能力。由此,本文提出如下研究假设:

H1b 农民工创业者的互联网嵌入对其创业韧性具有正向影响。

创业是一个对外部信息进行搜索、筛选、加工和利用的过程。尤其在中国经济转型情境下,创业机会信息的标准化程度低,高价值的创业信息和资源往往难以在市场中通过正规交易获得。此时,互联网和社会网络在传递创业信息和资源方面的非正式渠道就显得至关重要。对于创业农民工而言,在农村传统的熟人社会交往中,从小就建立起来的乡土关系扮演着联接个人与其他社会成员的桥梁,为获得所需的各类初始创业资源起到了重要支持作用^[14](P33-45)。不过,随着创业活动的不断开展,现有社会网络难以持续提供更多异质性信息和资源,而互联网嵌入恰好可以弥补这一缺陷^[6](P61-77)。互联网嵌入可以有效突破农民工创业者初始社会网络的资源类别局限以及时空限制,且农民工创业者受到身份、学历、不善言辞等多方面劣势的制约,在现实生活中与陌生人的人际交往和资源寻求过程中容易遭遇失败。而互联网虚拟空间提供了另一种交友或联系的途径^[21](P21-31)。由此,在社会结构和人际交往中处于相对劣势的农民工创业者,通过互联网嵌入,以较低的成本拓展了原先主要依托乡土社会关系的初始创业网络,从而破解创业过程中面临的资源同质化困境。据此,本文提出如下研究假设。

H1c 农民工创业者的二元网络嵌入对其创业韧性具有正向的交互影响。

(二) 创业反思的中介作用

网络嵌入有助于增加更多异质性知识和信息,弥补农民工创业劣势,但是从外部网络获得的新知识能否被有效利用和转化,还取决于创业者及其团队成员的创业反思程度。所谓创业反思,就是在创业实践活动中结合创业目标进行复盘回顾、总结和反省,通过充分、深入地思考和讨论,发现和纠正过去的错误和认知偏差。

一方面,二元网络嵌入有助于农民工开展创业反思。首先,社会网络中的信任关系降低了创业者的防御心理,使其更愿意暴露自身短板并接受反馈,这种心理安全感为开放性的反思活动提供了环境。其次,互联网为农民工创业者提供了多样化的实践经验与观点。当创业者与网络成员频繁互动时,不同的经营策略或问题解决方式可能引发认知冲突^[22](P43-46),促使创业者反思现有方法的局限性。最后,外部网络(包括社会网络与互联网)中的成功案例形成隐性规范压力^[23](P142-160),促使创业者主动对比自身差距并启动反思。

另一方面,创业反思有助于增强农民工创业韧性。首先,创业反思有助于创业者识别内外部环境变化以及创业过程中存在的问题与不足并采取措施进行调整。创业反思有效增加创业者对新创企业现状的熟悉程度,对自身短板和存在不足也能形成清醒、充分的认识,当面临外部环境冲击时,创业者能对手头资源进行及时、有效地利用^[24](P228-245),从而更好地应对外部冲击。其次,创业反思可视为对新创企业内部成员在思想与行动上的集体修正,通过创业反思能加强新创企业内部知识交流和凝聚力。由于新创企业成立时间短,成员之间还未深入了解,而集体的建设性互动可以让彼此之间更深入地理解各自的想法、工作方式和立场,通过加强交流和彼此谅解来缓解关系冲突、高效处理传递的信息,实现更加顺畅的沟通与合作,进而共同应对外部冲击与解决创业困难^[25](P140-150)。此外,农民工创业者及其团队成员往往知识水平偏低,通过反思性学习,有助于吸收外部知识重构新的知识体系,打破思维定式,增强整体创造力^[26](P1396-1409),进而能够创新性地思考当前困局,从中发掘潜在机会。在进行危机决策和信心重塑时,创业反思能够促进组织实现知识的共享与整合,帮助组织成员完善心智模式,增强创业

机会认知水平,并提出有效解决方案,从而提升新创企业在面临突发状况和危机时快速、精准地找到问题根源以及有效解决问题的能力。据此,本文提出如下研究假设。

H2a 创业反思在社会网络嵌入与创业韧性之间起到中介作用。

H2b 创业反思在互联网嵌入与创业韧性之间起到中介作用。

(三) 创业者先前经验的调节作用

以往研究发现,创业者在先前工作经历中积累的知识有助于更高效地开发和转化外部环境中与创业机会和创业资源相关的信息,从而正向影响创业者的机会识别和资源获取^[19](P140-152)。先前经验是指农民工创业者基于先前在城市务工经历所积累的缄默性知识,本文聚焦于考察农民工的先前工作经验,即行业经验和职能经验。行业经验是指创业者曾经在同一行业或相关行业的工作经验,使创业者了解行业相关的规范、惯例和信息,并建立了与客户、供应商等其他利益相关者的来往和交情^[27](P122-128)。职能经验是指创业者在特定的工作岗位(如销售、生产、后勤管理等)上所积累的经验,有助于创业者维持创业各个环节的有效开展和新创企业的正常运营。

农民工创业者嵌入外部网络的水平决定着个体所能摄取网络资源的数量和质量,但这并不意味着摄取资源相同的创业者就能产生相同的网络收益,因为先前经验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个体对所摄取信息和知识等资源的解读^[28](P48-58)。如果不能对所获取资源的价值进行准确评估,创业者的网络嵌入将难以发挥作用。换句话说,在获取资源相当的情况下,只有那些拥有相关经验的创业者才能实现手头资源的价值最大化^[29](P10-17)。例如,与缺乏相关行业经验的创业者相比,行业经验丰富的创业者往往更加容易把握客户或供应商的认知模式和行为特征,因而可以获得对企业更有利的外部资源支持^[27](P122-128)。此外,拥有相关职能经验的创业者,可以有效识别一些其他创业者无法立即发现的资源价值,从而提高对网络资源的开发利用效率和效果,缓解新创企业困境。也就是说,那些外部网络关系和结构特征都相似的创业者,其创业认知和决策会受各自不同的先前经验影响,而导致行为和表现上的差异。因此,本文提出如下研究假设。

H3a 农民工创业者先前的行业经验正向调节二元网络嵌入与创业韧性之间的关系。

H3b 农民工创业者先前的职能经验正向调节二元网络嵌入与创业韧性之间的关系。

三、研究设计

本研究依托课题组对上海、江苏和浙江三省市农民工创业者进行的实地调研,调研方式包括访谈和问卷调查。考虑到部分农民工创业者的文化程度不高,课题组通过逐家走访,在调查过程中对受访者进行问卷填写指导,保证了调研数据的真实性和可靠性。课题组通过调查最终获得476份有效问卷,调查对象均为已实施创业并具有外出务工经历的农民工创业者。从创业者年龄来看,25-35岁的样本占比最高(46%),其次是35-45岁(30.3%);从创业行业来看,主要集中在养殖种植(28.2%)、工业制造(21.4%)、农产品纺织品加工(17.8%)、餐饮服务(10.3%)、建材装修(8.0%)等行业。

本研究具体变量测量如下:

1. 因变量:创业韧性。创业韧性反映了创业者在逆境面前的应变和恢复能力,本文综合参考张秀娥和李梦莹等学者所使用的测量量表^[2](P96-108),从坚持、乐观等方面设计了6个测量题项。问卷设计采用Likert 5点计分法,即1-5分别表示对题项的描述“完全不同意”“比较不同意”“中立”“比较同意”“完全同意”。

表1是农民工创业韧性的描述性统计与探索性因子分析结果。其中,KMO样本充分性检验值为0.811,Bartlett球形检验值为1386.392($p < 0.001$),说明样本适合做因子分析。结果显示,各个测量题项的因子载荷均大于0.6,说明本文所使用的农民工创业韧性测量量表具有良好的收敛效度;并且,测量量表的信度系数(Cronbach's α 值)为0.805,说明该测量量表具有较高的信度。

表1 农民工创业韧性的描述性统计与信度效度检验

测量题项	均值	标准差	因子载荷	信度系数
创业过程虽有困难,但我不会放弃	3.441	1.105	0.756	0.805
不管创业结果如何,我都会尽最大努力	3.459	1.118	0.744	
不会因一时的困难而气馁	3.370	1.037	0.721	
自己是一个很坚强的人	3.409	0.985	0.718	
面对创业过程中的困难能保持乐观心态	3.367	0.868	0.712	
创业过程中不管遇到什么困难,我相信都能克服	3.352	0.971	0.707	

2. 自变量:社会网络与互联网嵌入。参考肖鹏等学者的研究^[30](P113-119),从网络强度、网络规模和网络异质性三个维度对农民工创业者社会网络嵌入情况进行测量;其中,社会网络的主体包括:家人和亲友、老乡、打工时期的工友。参考芮正云和方聪龙的研究^[9](P96-112),从联系度、匹配度和牺牲感三个维度对农民工创业者的互联网嵌入情况进行测量。问卷设计同样采用Likert 5点计分法,具体测量题项见表2。

表2 二元网络嵌入的描述性统计与信度效度检验

变量	测量题项	均值	标准差	因子载荷	信度系数
社会网络嵌入	与亲朋好友保持密切的联系	3.91	1.08	0.877	0.790
	与老乡保持密切的联系	3.65	1.12	0.756	
	与打工时期的工友保持密切的联系	3.30	1.07	0.698	
	可以交往的亲朋好友很多	3.81	0.96	0.765	
	可以交往的老乡很多	3.46	0.94	0.833	
	可以交往的工友很多	3.44	0.95	0.712	
	能从亲朋好友那里获得大量异质性信息	3.20	0.93	0.772	
	能从老乡那里获得大量异质性信息	3.45	1.03	0.830	
	能从工友那里获得大量异质性信息	3.43	1.02	0.753	
互联网嵌入	我经常上网参与互动	3.57	0.87	0.714	0.876
	我会在网络上关注别人在做什么	2.91	1.04	0.760	
	我的很多工作需要通过网络完成	2.89	1.09	0.798	
	我更喜欢通过网络获取信息	2.83	1.08	0.733	
	我觉得在网络上更能找到志同道合的朋友	2.75	1.14	0.787	
	我更喜欢在网络上和熟悉的朋友交流	2.56	1.15	0.725	
	离开网络会让我觉得和这个社会脱节	3.61	0.93	0.785	
	离开网络我需要付出更高的沟通或渠道成本	2.88	1.22	0.647	
	离开网络让我觉得会失去各种机会	3.15	1.14	0.780	

农民工创业者二元网络嵌入情况的描述性统计与探索性因子分析结果如表2所示。其中,社会网络嵌入的KMO检验值为0.764, Bartlett球形检验值为471.901($p < 0.001$),互联网嵌入的KMO检验值为0.766, Bartlett球形检验值为1105.628($p < 0.001$),说明样本适合做因子分析。结果显示,各个测量题项的因子载荷均大于0.6,说明本文测量农民工创业者二元网络嵌入的量表具有良好的收敛效度;并且社会网络嵌入与互联网嵌入的信度系数(Cronbach's α 值)分别为0.790和0.876,说明本文所使用的测量量表具有较高的信度。

3. 中介变量:创业反思。本文借鉴了团队反思的研究量表,从任务反省、过程反省与行动调整三个维度进行测量^[31](P26-33)。测量题项实例:我们会经常讨论实现创业目标的方法;我们会经常讨论完成工作的方法是否合适;我们会调整方法以完成创业任务。依据上述检验方法,本文的创业反思量表达达到

了信度与效度要求。

4. 调节变量: 先前经验。突破以往研究只关注创业者是否具有某一特定行业或岗位的工作经验, 以及工作时间长短的缺陷, 根据杨俊等学者的观点^[32](P116-125), 从经验多样性和经验相关性两个方面分别考察农民工创业者先前的行业经验和职能经验。对调查样本经验多样性的赋值情况如下: 如果创业者具有多个行业(大于两个)的打工经历, 赋值为1, 否则赋值为0; 如果创业者具有多个职能岗位的工作经验, 赋值为1, 否则赋值为0。对调查样本经验相关性的赋值情况如下: 如果创业者具有与所创建企业相关行业或本行业的打工经历, 赋值为1, 否则赋值为0; 如果创业者具有与创建和经营企业相关的岗位工作经历, 赋值为1, 否则赋值为0。

5. 控制变量。参考以往农民工创业研究成果, 本文将创业者的年龄、学历、婚姻状况, 以及新创企业年龄和规模(企业员工人数)设为控制变量。

本研究采用验证性因子分析(CFA)对理论模型中涉及的变量因子进行了区分效度检验, 结果如表3所示。其中, 五因子模型($\chi^2/df=2.63$, RMSEA=0.08, CFI=0.94, GFI=0.94, NFI=0.91)的拟合优度均达到标准要求, 且均优于备选模型, 表明各变量间具有良好的区分效度。此外, 本文采用Harman单因素方法进行检验, 对测量题项(包括自变量、因变量、中介变量)进行探索性因子分析(EFA), 结果显示最大因子的方差解释度为32.7%(低于临界值40%); 且验证性因子分析结果表明, 单因子模型拟合效果不佳, 由此可以判断, 本研究中的共同方法偏差问题不明显。最后, 本文采用方差膨胀因子(VIF)检验, 结果显示各变量VIF值介于1.23至2.87之间, 均远低于临界值10, 表明模型不存在严重的多重共线性问题。

表3 验证性因子分析结果

模型	χ^2/df	RMSEA	SRMR	CFI	GFI	NFI
四因子模型(社会网络嵌入, 互联网嵌入, 创业韧性, 创业反思)	2.63	0.08	0.05	0.94	0.94	0.91
三因子模型(社会网络嵌入+互联网嵌入, 创业韧性, 创业反思)	4.11	0.12	0.09	0.91	0.92	0.88
二因子模型(社会网络嵌入+互联网嵌入, 创业韧性+创业反思)	6.20	0.15	0.10	0.86	0.87	0.84
单因子模型(社会网络嵌入+互联网嵌入+创业韧性+创业反思)	7.97	0.18	0.13	0.82	0.83	0.80

四、实证分析

本文运用回归分析方法检验理论模型中的变量间关系, 首先实证分析二元网络嵌入与农民工创业韧性的关系以及二元网络的交互性作用, 随后验证了创业反思的中介作用和先前经验的调节作用, 并进一步从创业阶段与创业地点探讨二元网络嵌入效应的异质性影响。

(一) 假设检验

运用SPSS软件对调查数据进行分层回归分析, 分析结果如表4所示。其中, 模型1考察自变量对因变量的影响; 模型2考察自变量及其交互项对因变量的影响; 在此基础上, 模型3将中介变量纳入模型。模型4将行业经验及其与二元网络嵌入的交互项纳入回归模型, 考察行业经验在二元网络嵌入对创业韧性影响关系中的调节作用; 同理, 模型5将职能经验及其与二元网络嵌入的交互项纳入回归模型, 考察职能经验在二元网络嵌入对创业韧性影响关系中的调节作用。模型6为整体模型的全效应。

在模型1中, 社会网络嵌入与互联网嵌入对农民工创业韧性都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 说明农民工创业者社会网络与互联网的嵌入程度越高, 越有助于培育农民工创业韧性, 即假设H1a、H1b通过检验。模型2的分析结果表明, 社会网络嵌入与互联网嵌入的交互项对创业韧性有显著的正向影响, 说明二元网络嵌入具有互补效应, 故H1c通过检验。结合模型2与模型3的分析结果可以看出, 创业反思在二元网络嵌入与农民工创业韧性之间起到中介作用, 从而验证了H2a、H2b。在模型4中, 社会网络嵌入与行业经验的交互项对农民工创业韧性的影响不显著, 而互联网嵌入与行业经验的交互项对农民工创业韧性

表 4 回归分析结果

变量名	因变量:创业韧性					
	模型 1	模型 2	模型 3	模型 4	模型 5	模型 6
创业者年龄	0.069	0.066	0.060	0.049	0.040	0.038
创业者学历	0.062	0.050	0.041	0.062	0.047	0.040
婚姻状况	0.033	0.026	0.020	0.024	0.025	0.017
企业年龄	0.103*	0.063	0.055	0.057	0.064	0.051
企业规模	0.081	0.072	0.063	0.068	0.075	0.066
社会网络嵌入	0.319**	0.280**	0.254**	0.262**	0.310**	0.228**
互联网嵌入	0.220**	0.195*	0.173*	0.190*	0.171*	0.154*
社会网络嵌入×互联网嵌入		0.122*	0.114*			0.106*
创业反思			0.159*			0.117*
行业经验				0.083		0.059
职能经验					0.049	0.034
社会网络嵌入×行业经验				0.053		0.032
互联网嵌入×行业经验				0.161*		0.140*
社会网络嵌入×职能经验					0.113*	0.105*
互联网嵌入×职能经验					0.035	0.011
R ²	0.241	0.295	0.337	0.384	0.363	0.409
F 值	8.190***	8.882***	9.554***	10.526***	9.955***	11.472***

注: *、**、***分别表示在 10%、5%和 1%的水平上显著。

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说明行业经验仅正向调节互联网嵌入对农民工创业韧性的影响,即假设 H3a 部分通过检验。在模型 5 中,社会网络嵌入与职能经验的交互项对农民工创业韧性有显著影响,但互联网嵌入与职能经验的交互项对农民工创业韧性没有显著影响,说明职能经验仅调节社会网络嵌入对农民工创业韧性的影响,即假设 H3b 部分通过检验。

上述分析结果表明:第一,二元网络嵌入对农民工创业韧性具有重要影响。依据创业网络理论,血缘、地缘等构成的“强关系”社会网络是获取创业资源的基础^[5](P27-38),通过资源缓冲(如亲友应急借款)与规范约束(如乡土社会的互助义务)能帮助农民工缓解创业危机。尽管如此,在信息技术日益普及的趋势下,创业者与外界的产业合作及跨区域的线上联系同样不可忽视。互联网嵌入打破了空间地域限制,可以实现市场信息的高效传递,使农民工创业者跨越“数字鸿沟”搜集到行业前沿资讯,从而打破农民工创业过程中遭遇的知识壁垒与认知局限。并且,本文发现社会网络嵌入对农民工创业韧性的促进作用大于互联网嵌入,这也与课题组在实地调研过程中与创业者的访谈结果一致:农民工创业者在创业之初,主要依靠社会网络获得必要的帮助和支持。原因在于,创业需要承担一定的风险,根据“强关系”理论,农民工的社会网络以血缘、地缘为核心,具有高信任度、高互惠性与低交易成本的特征。一方面,这种网络特性在创业逆境中发挥关键作用,在突发危机中能够快速响应。例如,在创业者面临危机时提供无条件的情感支持与应急资源(如赊账、借款、人力支援),直接缓解压力并增强抗风险能力。且社会网络成员对创业者的实际需求(如特定行业的人脉、本地市场信息)有更精准的理解,资源匹配效率更高。基于这种匹配度高的场景化资源优势,社会网络成员的互动更利于传递隐性知识(如对本地员工的管理技巧、当地市场开拓策略),这些隐性知识是提升经营管理能力的重要方面。另一方面,互联网嵌入主要依赖“弱关系”,其联结更多基于利益交换而非情感纽带,即在互联网中,成员之间彼此往往是虚拟的陌生身份或者基于经济利益的契约交易,信任门槛较高;由于线上合作需经历长期验证才能建立信任,而新创企业的“新生劣势”加剧了合作方的风险规避倾向。由此可见,互联网嵌入受限于“弱关系”的工具性特点,而社会网络嵌入对创业韧性的更大影响源于其强关系的情感支持、隐性知识传递与高时效

资源供给。

以往学者主要关注了两类关系网络的独立效应,鲜有探究两者间交互影响的经验证据,而本研究回应了学界关于两者间究竟存在“时间置换效应”还是“社会补偿效应”的争论^[33](P63-81)。一方面,互联网嵌入可以帮助农民工创业者打破其初始社会资源禀赋所形成的时空障碍,使其外部资源渠道得以拓展,从而获得大量异质性信息,也降低了知识搜索和资源交易的时间与经济成本。尤其在近年来疫情等应急事件的冲击下,互联网的便捷性更有利于社会关系的巩固维系和持续积累,在线互动也在一定程度上替代了面对面的交流方式。另一方面,现实中的社会网络差序格局有助于创业者筛选、评估信息的真实性和价值性,提高了外部资源的利用效率和决策正确性。最终,互联网与社会网络部分交叠、相互作用而呈现“互嵌”关系。调查中也发现创业者往往会综合利用社交平台、媒体等网络渠道和现实人际关系。

第二,研究证实创业反思在二元网络嵌入与农民工创业韧性之间起到显著的中介作用。如前所述,农民工创业群体面临更严峻的知识与认知局限,而创业反思是一个组织内部交流观点、共享信息的过程,为成员之间相互理解、学习借鉴、吸取经验教训提供了组织机制。二元网络嵌入虽然为农民工创业者及其新创企业获取异质性知识提供了广泛渠道,但是对外部新知识的有效利用还需要通过创业反思来推动成员间的交流与思考,促进信息解读与整合,提升创业团队整体认知水平。有研究认为经常进行反思的组织对环境的变化会更敏感,也更能做出有效应对和及时调整^[17](P1759-1769)。尤其是新创企业缺乏足够的经营经验,面对突发状况和环境变化难免手足无措、冲动决策,通过创业反思快速找到可行方案或可改进之处,以适应外部动态的环境要求,因而创业反思能正向影响创业韧性。此外,创业者开展反思活动时,团队成员会用批判的眼光共同回顾和剖析创业过程,主动地交换信息,进行想法的碰撞,通过交流、整合相关信息,根本性地分析、处理问题。

第三,上述调节效应表明:首先,创业者先前的行业经验只能够正向调节互联网嵌入与创业韧性的作用关系。说明农民工创业者的行业经验越丰富,越能够与互联网成员进行有效的沟通和互动,形成相互信任的合作机制,充分开发和获取外界的广泛资源。不过,由于农民工创业者的社会网络主体大多源于血缘、亲缘和地缘,与其先前特定的行业经历关联不大,拥有丰富的行业经验并不能提高创业者与社会网络成员的关系强度和关系质量,因而创业者的行业经验对社会网络嵌入与创业韧性关系的调节作用不显著。

其次,农民工创业者先前的职能经验仅在社会网络嵌入与创业韧性之间起到了显著的正向调节作用。可能是由于农民工创业者先前大多从事生产制造、后勤服务、市场销售等岗位,很少接触财务管理、技术研发、人力资源管理等方面的工作,即使创业者的职能经验很丰富,依然难以有效识别和开发互联网上潜在的高价值商业机会和资源,因而无法调节互联网嵌入与创业韧性之间的作用关系。

此外,模型4和模型5的分析结果还表明,农民工创业者先前的行业经验与职能经验对创业韧性并没有显著影响($p>0.1$),说明并非创业者的先前经验越丰富,其创业韧性一定就越强。即创业者先前经验并不是直接作用于创业韧性的。这也与刘轩和马海韵的观点一致^[34](P58-69),从而支持了本文将先前经验作为调节变量的观点。

(二) 异质性分析

在完成假设验证基础上,本文进一步考察二元网络嵌入影响效应的时空差异性,即在不同创业阶段和不同创业地点的作用差异。

1. 创业阶段异质性分析

本文先从农民工创业韧性的动态视角分析不同创业阶段对上述分析结果是否存在差异化影响,将调查样本分为初创阶段与成长阶段两个子样本,分别进行回归分析。结果如表5所示。

对比两组分析结果可以发现:

表 5 二元网络嵌入对农民工创业韧性影响效应的阶段性差异

变量名	初创阶段		成长阶段	
	模型 7	模型 8	模型 9	模型 10
创业者年龄	0.049	0.033	0.055	0.037
创业者学历	0.032	0.018	0.040	0.024
婚姻状况	0.028	0.022	0.014	0.009
企业年龄	0.011	-0.005	0.016	-0.002
企业规模	0.074	0.050	0.058	0.035
社会网络嵌入	0.228**	0.203**	0.146*	0.120*
互联网嵌入	0.151*	0.124*	0.240**	0.227**
行业经验		0.022		0.015
职能经验		0.036		0.003
社会网络嵌入×互联网嵌入		0.075		0.149*
社会网络嵌入×行业经验		0.110*		0.038
互联网嵌入×行业经验		0.177*		0.125*
社会网络嵌入×职能经验		0.189*		-0.081
互联网嵌入×职能经验		0.052		-0.006
R ²	0.125	0.261	0.130	0.278
F 值	6.552***	8.930***	7.065***	9.811***

注：*、**、***分别表示在 10%、5%和 1%的水平上显著。

第一,从创业发展阶段来看,初创阶段的社会网络嵌入更为重要;而在成长阶段,互联网嵌入则更为重要。农民工在创业初期,大多依赖初始社会网络成员(如家人、同学、老乡等)。随着创业活动不断发展,创业者对资源的需求类别和数量都会进一步增加。换言之,原先社会网络所蕴含的资源已经难以满足创业成长阶段的新要求。此时,创业者会积极利用互联网开拓资源渠道,从而更快速、便利地获得多样化资源。

第二,在创业初期,社会网络与互联网的交互项对创业韧性没有起到显著影响;而在创业成长期,二元网络嵌入呈现显著的正向影响。在创业初期,农民工创业者的互联网嵌入在嵌入规模和嵌入深度上都处于较低水平,创业者主要依赖社会网络嵌入,因此两者的交互作用不显著。而到了创业成长阶段,互联网嵌入水平有了一定提高,可以弥补社会网络嵌入同质化较强的缺陷,提供更加多元化的资讯和资源,由此二元网络嵌入形成互补的协同增效作用。

第三,在创业初期,先前行业经验在二元网络嵌入与创业韧性之间均起到了显著的调节作用,职能经验则显著正向调节社会网络嵌入与创业韧性之间的作用关系;而在创业成长阶段,先前经验的调节效应主要体现在行业经验在互联网嵌入与创业韧性之间依然起着显著的调节作用,此时职能经验的调节作用方向变为负向且并不显著。在创业早期,农民工创业者可以依靠先前积累的行业经验和职能经验,强化二元网络嵌入对创业韧性的促进作用。例如,丰富的行业经验有助于识别和评估外来信息的价值和可靠性,而职能经验有助于创业者对熟悉的资源进行“创造性拼凑”。到了成长阶段,创业者行业经验的作用强于职能经验。可能因为,具有丰富行业经验的创业者拥有更宽广的眼界,而丰富的职能经验容易导致创业者陷入“全面拼凑”的负强化,难以支撑新创企业持续成长。

2. 城乡差异分析

为了分析留城与返乡的农民工创业者之间存在的潜在差异,本文将调查样本分为留城创业与返乡创业两个子样本,分别进行回归分析。结果如表 6 所示。

对比两组分析结果可以发现:

第一,对于留城创业的农民工而言,社会网络嵌入对创业韧性的影响更大;对于返乡创业的农民工

表6 二元网络嵌入对农民工创业韧性影响效应的城乡差异

变量名	留城创业		返乡创业	
	模型 11	模型 12	模型 13	模型 14
创业者年龄	0.056	0.047	0.069	0.058
创业者学历	0.040	0.032	0.058	0.044
婚姻状况	0.003	0.002	0.015	0.010
企业年龄	-0.033	-0.027	-0.045	-0.032
企业规模	0.106*	0.081	0.074	0.065
社会网络嵌入	0.329**	0.290**	0.137*	0.129*
互联网嵌入	0.188*	0.155*	0.272**	0.254**
行业经验		0.037		0.040
职能经验		0.044		0.043
社会网络嵌入×互联网嵌入		0.129*		0.087
社会网络嵌入×行业经验		0.038		0.029
互联网嵌入×行业经验		0.112*		0.177*
社会网络嵌入×职能经验		0.190*		0.108*
互联网嵌入×职能经验		0.033		0.026
R^2	0.148	0.286	0.163	0.247
F 值	7.537***	9.462***	7.608***	10.034***

注：*、**、***分别表示在10%、5%和1%的水平上显著。

而言,互联网嵌入对创业韧性的影响更大。这可能是由于在城市创业过程中,农民工仍然属于“外来者”,且商业思维薄弱、缺乏商业信任基础,这就要求在城市创业的农民工首先需构建熟人关系来嵌入城市中的社会网络,进而在逐渐获得外部信任的基础上开展业务往来。且创业者自身所拥有的家乡熟人关系,受限于空间距离而难以发挥作用,因而需要在所处城市积极拓展新的社会网络。而返乡创业的农民工远离城市较为完善的产业基础和市场渠道,需要借助互联网优势弥补农村营商环境和产业氛围相对较弱的不足。

第二,对于留城创业的农民工而言,社会网络嵌入与互联网嵌入可以起到积极的互补作用;对于返乡创业的农民工而言,社会网络嵌入与互联网嵌入的互补效应不明显。留城创业要求创业者既要开拓新的社会网络以弥补新生劣势与资源短板,也要依托城市完善的基础设施利用互联网获取更多信息、资源,并将不同渠道的资源充分整合,形成二元网络嵌入的互补。而返乡创业的农民工虽然能够获得家乡熟人关系的支持,但是该社会网络中蕴含的资源极为有限且同质化严重,因而对互联网的利用更为迫切,此时的二元网络嵌入呈现明显的不平衡,故难以产生协同增效作用。

第三,无论返乡还是留城创业,先前行业经验主要正向调节互联网嵌入与创业韧性之间的作用关系,而职能经验主要正向调节社会网络嵌入与创业韧性之间的作用关系。这一结果与全样本的分析结果基本一致,说明本研究的假设检验结果具有较强的稳健性。比较影响系数可知,对于留城创业的农民工,其先前的职能经验在创业过程中更为关键。如前所述,留城创业的农民工对社会网络嵌入更为依赖,先前职能经验有助于积攒相关的专业性威望,这种威望有助于农民工创业者获得社会认可和口碑传播,进而强化社会网络嵌入效果。而对于返乡创业的农民工,其先前的行业经验在创业过程中更为重要。农民工创业者的行业经验越丰富,越能识别和评估相关行业中有前景的商业机会,而互联网嵌入可以更好地助力农民工创业者开发利用这些商机,因此,互联网嵌入与创业者行业经验的交互作用更为积极。

五、结论与启示

本文结合农民工创业特点,对二元网络嵌入、创业反思、先前经验与农民工创业韧性之间的逻辑关系进行了实证检验。结果发现:首先,社会网络嵌入与互联网嵌入对农民工创业成长都具有积极影响,且与互联网嵌入相比,社会网络嵌入对农民工创业韧性的影响更大。其次,机制分析揭示了创业反思在二元网络嵌入与农民工创业韧性之间发挥中介作用。再次,农民工创业者的先前经验并不是直接作用于创业韧性,具体而言,先前的行业经验正向调节互联网嵌入与创业韧性之间的作用关系,先前的职能经验正向调节社会网络嵌入与创业韧性之间的作用关系。最后,从创业阶段异质性来看,初创阶段农民工创业韧性受社会网络嵌入的影响更大;成长阶段互联网嵌入更为重要;城乡分组回归分析结果显示,留城创业农民工受到社会网络嵌入的影响更为突出,而返乡创业农民工受到互联网嵌入的影响更大。

根据上述研究,得出如下几点管理启示:

第一,农民工创业者应当增强社交能力,克服社会排斥,积极开拓社会网络规模。在中国传统的关系型社会背景下,农民工创业者需要不断强化网络嵌入意识,并掌握社会交往的技巧,以促进社会关系的联结和维护,通过不断提高自己的网络运用能力来克服制度等方面的制约。例如,在巩固已有社会关系来往的基础上,利用现有网络节点的桥梁作用,去构建更加丰富的人脉关系网络,同时有意识地嵌入更高层次的社会“圈子”以提高社会资本的质量。

第二,农民工创业者需要重视互联网嵌入,借助互联网化解现实社交中的“身份劣势”与“信息孤岛”困境。实现互联网的有效嵌入,一方面可以突破传统的组织边界,使得创业者能在更广阔的范围内开发创业资源,以及拓展渠道参与产业链分工。另一方面,创业者有机会与其他机构或企业建立合作机制,从而能够降低获取网络资源的交易成本,这对于实力有限的农民工创业者来说非常必要。因此,农民工创业者需要提升网络素养,在互联网情境下通过沟通互动和商业互惠来强化与互联网成员间的信任与认同。例如,参加提升互联网应用能力方面的创业培训,通过电商等方式增强新创企业与外界的产业联系。

第三,农民工创业者应当建立创业反思机制,通过在创业过程中及时、系统地进行集体反思,快速识别潜在的问题与机会,以适应环境不确定性。应当营造鼓励批判、建言的组织氛围,并以包容的态度对不同成员间的观点、思维进行吸纳、整合,提升农民工创业者的企业经营管理水平。在新创企业内部树立变革导向,引导成员培养发散性、探索性思维,鼓励知识共享、畅所欲言,保持新创企业的内部活性。

最后,分阶段、分地域设计扶持性创业政策。一方面,需匹配创业生命周期的资源需求。在初创阶段,地方政府与创业孵化器可搭建创业平台,组织农民工创业者与本地企业家、行业协会对接,促进经验共享与资源互助;对处于成长阶段的创业者,重点提升其互联网嵌入能力,例如开设关于直播带货、数据分析、线上客户管理等方面的培训。另一方面,要分地域施策,针对城乡差异定制支持方案。对于留城创业者,帮助其加强本地化社会网络的嵌入,例如城市工业园区或创业园区与本地商会、行业协会等组织合作,为农民工创业者提供“合法性”方面的认证和背书,进而推荐给供应商和客户,缓解其“外来者”劣势。对于返乡创业者,政府应夯实互联网基础设施与生态,例如牵头与电商平台等机构签订合作协议,为返乡创业者提供流量扶持与运营指导。

参考文献

- [1] 熊智伟,黄声兰. 社会支持视角下返乡农民工创业失败修复研究——基于中部五省401份微观数据. 农林经济管理学报,2018,(6).
- [2] 张秀娥,李梦莹. 创业韧性的驱动因素及其对创业成功的影响研究. 外国经济与管理,2020,(8).
- [3] E. Lafuente, Y. Vaillant, F. Vendrell-Herrero et al. Bouncing Back from Failure: Entrepreneurial Resilience and the Internationalisation of Subsequent Ventures Created by Serial Entrepreneurs. *Applied Psychology*, 2019, 68(4).

- [4] S. Fosstenlökken, K. Elin, V. Viktorija. Entrepreneurial Networks in Localized Embedding Practices: A Case Study from the Norwegian Micro Wool Industry. *Small Enterprise Research*, 2023, 30(2).
- [5] 苏岚岚, 彭艳玲, 孔荣. 社会网络对农户创业绩效的影响研究——基于创业资源可得性的中介效应分析. 财贸研究, 2017, (9).
- [6] 袁方, 史清华. 从返乡到创业——互联网接入对农民工决策影响的实证分析. 南方经济, 2019, (10).
- [7] 武汉大学国家发展战略智库课题组. 电商创业带动就业与乡村振兴的机理及效应——基于湖北省枝江市电商创业与发展模式的调研. 武汉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2, (6).
- [8] 曾亿武, 马长江, 李丽莉等. 直播电商与农产品上行价值重构: 机理与实现路径. 农业经济问题, 2022, (2).
- [9] 芮正云, 方聪龙. 互联网嵌入与农村创业者节俭式创新: 二元机会开发的协同与平衡. 中国农村经济, 2018, (7).
- [10] 陈逢文, 付龙望, 洪家瑶. 创业网络演化过程如何发生——基于“结构—行为”互动机制的案例研究. 南开管理评论, 2019, (2).
- [11] R. Lee, H. Tuselmann, D. Jayawarna et al. Effects of Structural, Relational and Cognitive Social Capital on Resource Acquisition: A Study of Entrepreneurs Residing in Multiply Deprived Areas. *Entrepreneurship & Regional Development*, 2019, 31(5).
- [12] 芮正云, 史清华. 农民创业者网络能力影响知识搜寻的阶段性差异研究. 农林经济管理学报, 2025, (2).
- [13] 尹航, 樊步青, 高雯. 组合创业者关系网络何以影响创业动机类型. 中国软科学, 2023, (9).
- [14] 陈菊慧, 朱秋博, 白军飞. 新型故乡联结对农民工返乡的影响. 农业技术经济, 2022, (6).
- [15] 王轶, 王香媚. 农民工的社会网络能提升返乡创业企业经营绩效吗? ——基于全国返乡创业企业的调查数据. 华中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3, (1).
- [16] 马鸿佳, 张弼弘, 郭北辰. 创业反思的形成过程与惯例更新关系的机制研究. 管理学报, 2022, (6).
- [17] 刘薇, 沈晓玲. 团队行动中反思与团队创新关系研究的动态视角——认知与情绪的双元路径. 心理科学进展, 2022, (8).
- [18] K. Jiao, Y. Ling, F. Kellermanns. Does Prior Experience Matter? A Meta-analysis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Prior Experience of Entrepreneurs and Firm Performance. *Journal of Small Business Management*, 2023, 61(6).
- [19] 董静, 赵策, 苏小娜. 宗族网络与企业创新——农村创业者先前经验的协同与平衡. 财经研究, 2019, (11).
- [20] M. Ahsan, S. Adomako, K. F. Mole. Perceived Institutional Support and Small Venture Performance: The Mediating Role of Entrepreneurial Persistence. *International Small Business Journal*, 2021, 39(1).
- [21] 许丹红. 互联网使用动机、网络密度与网民社会资本. 青年研究, 2016, (6).
- [22] 陈家昌, 赵澄谋. 知识异质性与知识创造: 认知冲突的中介作用. 情报杂志, 2016, (4).
- [23] 尚航标, 杨楚唯, 李卫宁等. 女承父业对组合创业的影响: 基于我国家族企业上市公司数据的证据. 科学学与科学技术管理, 2022, (5).
- [24] 尹奎, 迟志康, 董念念等. 团队反思与团队资源开发、利用及团队结果的关系: 一项元分析. 心理科学进展, 2024, (2).
- [25] 谢雅萍, 叶丹容. 创业失败修复、共享心智模式与团队创业激情. 科技进步与对策, 2022, (10).
- [26] P. Leblanc, V. Rousseau, J. Harvey. Leader Humility and Team Innovation: The Role of Team Reflexivity and Team Proactive Personality. *Journal of Organizational Behavior*, 2022, 43(8).
- [27] 赵文红, 黄姗姗. 挫而不折: 创业挫折应对策略对创业绩效的影响研究. 软科学, 2024, (12).
- [28] 王玲, 冯永春, 王亚茹. 先前经验、创业学习与环境不确定性如何激发创业想象力——基于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 科技进步与对策, 2025, (19).
- [29] 刘艳秋, 从春伟, 华连连等. 创业者先前经验对渐进性创新的影响机制——创业拼凑的中介作用. 科技进步与对策, 2020, (21).
- [30] 肖鹏, 周杨心悦, 刘景东等. 社会网络、关系质量与新创企业成长关系研究. 科技进步与对策, 2018, (18).
- [31] 张文勤, 刘云. 研发团队反思的结构检验及其对团队效能与效率的影响. 南开管理评论, 2011, (3).
- [32] 杨俊, 薛红志, 牛芳. 先前工作经验、创业机会与新技术企业绩效——一个交互效应模型及启示. 管理学报, 2011, (1).

[33] 王浩林,王子鸣. 网络“互嵌”与农村家庭创业选择——兼论共同富裕实现. 中国农村经济, 2022, (9).

[34] 刘轩,马海韵. 返乡创业支持网络与创业获得感:基于资源、规模和经验的综合视角. 财贸研究, 2020, (1).

The Dual Network Embedding and the Entrepreneurial Resilience of Migrant Workers

Rui Zhengyun, Shi Qinghua (Shanghai JiaoTong University)

Abstract Previous studies on migrant workers' entrepreneurship have underscored the critical role of external network embedding, but yet they have seldom explored its impact on entrepreneurial resilience, nor have they explored the interaction and spatio-temporal differences among different types of network embedding. Drawing on entrepreneurial network theory, this paper explores the influence mechanism of dual network (social network and Internet) embedding on the entrepreneurial resilience of migrant workers, with an empirical study conducted via regression analysis. The finding reveal that: (1) Both social network embedding and Internet embedding positively contribute to migrant workers' entrepreneurial resilience, with the former exhibiting a stronger effect; the parallel embedding of social networks and the Internet has a synergistic effect. (2) Entrepreneurial reflexivity mediate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dual network embedding and entrepreneurial resilience. (3) The prior industry experience of migrant worker entrepreneurs positively moderate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Internet embedding and entrepreneurial resilience, while their previous functional experience mainly positively moderate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social network embedding and entrepreneurial resilience. (4)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heterogeneity of entrepreneurial stages, social network embedding has a greater impact on the entrepreneurial resilience of migrant workers in the start-up stage, whereas Internet embedding becomes more critical in the growth stage. The subgroup regression analysis by urban-rural classification shows that migrant workers who start businesses in cities are more affected by social network embedding, while those who return to their hometowns to start businesses are more affected by Internet embedding.

Key words entrepreneurial resilience; entrepreneurial reflexivity; internet embedding; social networks

■ 作者简介 芮正云,上海交通大学安泰经济与管理学院博士后,兰州大学管理学院副教授,上海 200030;
史清华(通讯作者),上海交通大学安泰经济与管理学院教授。

■ 责任编辑 桂 莉